

在南韩继村蹲点的回顾

肖文奎 口述 李志国 整理

人到老年，许多往事、许多故人、许多旧地，往往会在脑海里闪现。然而，记忆最深、最令我难忘的莫过于 1964 年在南韩继村蹲点的岁月。当时，我在周口店公社从事党委组织工作，2 月 10 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社论和通讯，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艰苦奋斗，发展生产的事迹。公社党委及时组织学习，并作出决定：要以小‘四清’为动力，重点抓好南韩继村先进典型，以点带面，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。并派我到南韩继村蹲点。

旱高台变米粮川

1964 年春节刚过，大地尚未苏醒，我怀着急切的心情，骑自行车，带上铺盖，来到南韩继村，党支部书记徐庆文同志热情的接待了我。向他说明来意，他高兴地说：“感谢公社党委派领导来帮助指导工作。”他向我简单介绍了村里的情况后，把我带到社员王富家的住处。他说：“王是建国前的老党员，这家人待人

和善，住房也宽敞，你住在这里，吃饭由大队派饭员给你派。你有文化、又年轻，要多帮我拿主意，抓大事，咱俩一块唱好多打粮食这台戏。”我说：“咱们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，共同努力，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。”

通过“三同”(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)，个别走访，书记的介绍，我对这个村的村情民意，历年对土地的改造、兴修水利、实施农业“八字宪法”，粮食产量等情况，均有了一定了解，从而，结合大寨经验，帮助制订了四顶措施。

1、学大寨，找差距。通过对大寨经验的学习，进一步解决了干部和社员中普遍存在的“地力用尽，产量到顶。”的故步自封认识，进一步激发干部和社员上水平、上档次、上台阶的热情，实现今年粮食生产再跨越。

2、学习《红旗》杂志“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十大好处”，使干部认识到参加劳动的重要意义，干部坚持参加劳动，无特殊情况，白天不开会、少开会，把会议和学习都要放到晚上时间。

3、抓思想教育。结合实际，大讲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，农田基本建设给南韩继村带来的好处。大讲为国家多生产粮食是社员的光荣义务与责任。大力宣传在生产劳动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，使社员学有榜样、赶有目标，形成人人学先进、赶先进的热潮。

4、对照农业“八字宪法”，着重在庄稼密植、施肥、管理上下功夫，做足力气，提高产量。这些举措，进

一步激发和调动了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。社员们高兴地说：“干部下田间，有活一起干，问题解决快，社员干的欢。”干部深有体会地说：“锄头不用要生锈，干部不劳动会走邪路……”

通过“三同”我也与南韩继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。一次，我和社员一起搞夜战推粪，不甚伤了腿，社员硬把我送到住处，蔡大娘，一直几天守候在我的身旁，给我又是拿药、又是端水，又是送来吃的，对我关怀备至，真像母亲对待自己儿子那样照顾我，疼爱我。老人的恩情，我一直铭记在心里，至今难以忘怀。正当干部和社员们看着大地葱绿葱绿的麦苗儿长势喜人，盼着夏季大丰收的时候，突然，小麦黄锈病降到麦田，干部和社员心急如焚，及时向县农科部门的技术人员请教。得知用硫磺合剂喷洒的方法后，迅速组织 150 多名社员仅用两天时间，就将 800 亩麦田普遍喷洒了一遍。由于干部和社员齐心协力及时防治，控制了黄锈病的发展。小麦虽然遇上了灾害，但损失降到了最低，比计划略有减少。详细算账，粮食虽然因灾减产，但今年种植面积仍多于去年，白薯的种植也比去年多，总的产量影响不大。同时，提出“夏粮减产，秋粮补”的口号，对秋庄稼多施肥，在管理上多下功夫，力争把减产的粮食补回来。

8 月的南韩继村，风景如画，300 多亩玉米竞相扬花吐穗，人们喜上眉梢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突然，一场狂风暴雨袭来，把喜人的玉米全都刮倒了。徐庆文

跟我商量说：“雨一停咱们就组织人把玉米都扶起来，越早越好。”于是，立即组织 200 多名社员，用一天多的时间，把刮倒的玉米全都扶起来了。该培土的培了土，又多追了一次肥，多锄了一遍地。这一年，在大灾之年，粮食不仅没有减产，经过努力，粮食总产量达到了 1071200 斤，亩产平均 938 斤，比上年多增产粮食 9 万多斤，亩产增加 87 斤。南韩继村，为什么能够连年增产增收？经过反复调查研究，全面分析，主要是：

一是穷则思变。解放前，这个村是有名的穷困村，大部分土地都是“偏坡溜岗十八沟，十年九旱八不收”的旱高台。粮食亩产仅有百余斤，且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少数富人手里，绝大多数都是受苦人。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谚语：“三把刀”、“三条路”和“三件宝”。农民头上“三把刀”即租重、税多、利钱高；“三条路”即逃荒、讨饭、到他乡；“三件宝”即背架子、趿子鞋、破棉袄。解放后，农民翻了身，对新社会更加热爱，听党和政府的话，党叫干啥就干啥。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，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坚持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，大搞农业基本建设，先后投入人工 4 万多个，平坡岗、填大洼、修水渠、田间路等。打井百余眼，把绝大多数土地都改造成了大面积稳产高产田，使粮食连年增产。从 1957 年平均亩产 356 斤，到 1964 年一跃亩产达到 938 斤。从 1957 年到 1964 年，共向国家交售商品粮 200 多万斤。同时，社员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。1964 年年终全村人均收入达到 90 多元比七年前有较大的提高。

二是好领头人。俗话说：“火车跑的快，全靠车头带”。党支部书记徐庆文，旧社会苦大仇深，后来参加了解放军，得到了锻炼，在部队，他出生入死，英勇杀敌，多次立功。回村后，他决心改变农村面貌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。他有一颗“为民、忠诚、公正、清廉、无私”的心，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，在农业战线上为国家做出了贡献，受到了上级党委和农业主管部门的认可与肯定，也受到了南韩继村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与爱戴。他也多次被评为市县的劳动模范，并受到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多次表彰。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，在劳模会上，受到了邓小平、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，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。

三是坚强的领导班子。南韩继村农业生产能够快速增长和他们的领导班子团结、民主分不开，这个村党支部共有五名委员组成，大队长孙凤成，副大队长王文忠，妇女大队长刘玉淑和民兵连长葛万成。五位同志各有分工，各负其责，原则问题坚持集体讨论，分工份内的工作不等不靠。五名支委都能做到原则问题不让步，小事不纠缠，每个支委都自觉坚持参加劳动，做到在劳动中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支部形成了既有集中，又有民主，既有统一意志，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气氛，在群众中形成很大的凝聚力。

我与将军同劳动

乡村四月闲人少，耙完麦子又插秧。四月的南韩继村，到处是一派繁忙的闹春耕景象。一天上午，军事学院的两位将军带着 300 名军官学员来到南韩继村。这天，徐庆文书记不在，由我负责接待和安排。他们分为三个连队，每连 100 人，一个连队住在这个村，另外两个连队住在瓦井村和小次洛村。他们共七天的时间，学习和劳动都集中在这个村。他们来村的任务是：一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，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。二是了解农村阶级斗争情况，提高部队干部的阶级觉悟。三是调查了解这个村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和新农村的变化。根据任务，制订了三天与社员一起劳动，两天集中学习，一天座谈和个人总结的工作计划。

当时，正值栽白薯秧时节，因栽白薯秧地块属尚未改造的土地，需要把水引到地下面的大坑内蓄水。然后，再从蓄水池用水桶往上淘，之后再挑到栽薯秧地方。挖坑、点水、培土。我和一位将军负责从蓄水池用水桶往上掏水，将军卷起裤腿、光着脚丫，先下池掏水，一直掏到 80 多桶时，腿有些抽筋，身体也有些发抖。我劝他上来，我下去，他怎么也不肯，笑着说：“我正是壮年，筋骨硬，也经冻，掏够一百桶时再说，战争年代 365 天，除打仗就是劳动，现在一年才干几天那！和平年代不劳动，就会变懒，一懒打起仗来就要吃败仗。今天机会难得，是锻炼的好机会。”他硬是坚持掏到百桶时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这回该你了。”我开玩笑地说：“你不再掏几桶了，发扬风格吗？”他笑着说：“你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”。我说着接过来桶，掏了起来。大校闫达（徐庆文的老战友）负责挑水，一连挑了很长时间，肩膀被压肿了，社员们劝他休息会儿，他却笑笑说：“没关系，肿了再把它压平了，平了就不疼了。”一直坚持挑了一整天。这批军官学员，脏活累活抢着干，有的脚被碰破了，坚持不停歇，令在场的社员深受鼓舞和感动。第一天军民同心干，就栽了 50 亩地，15 万棵白薯秧，圆满完成栽薯秧的任务。

我向部长作汇报

6 月的一天下午 3 时许，我正要出门，忽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院子的门前，一位社员领着时任交通部长的王首道前来找我，我把他们领进屋。部长边用草帽扇着汗，边自报门户说：“我叫王首道，是交通部的，中央正在京开着会，下午休息，我趁这个机会到这里看看，了解一下村里学大寨情况。听社员说你是在这里蹲点的干部，所以，就来麻烦你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肖文奎”。他又指着那位女同志说：“这个是我的爱人”，“那个是我的秘书”。然后又说：“今天不是来检查工作，是来了解一下农村情况，怎么方便就怎么说”。我把南韩继村的基本情况，历年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多年来粮食连年增长，社员增收及学大寨等情况一一向部长作了汇报。部长有时插话，我也有问有答。我汇报了一个多小时，

汇报结束后,他说:“谢谢你为我们介绍了不少情况,这些情况,对我们很有帮助,我们在上面是很难得到的。”然后,他风趣地说:“你送人送到家吧,你再辛苦一下,带我们到地里看看,光听不行,眼见为实嘛,有听有看才叫了解全面。”我说:“您要不要休息会儿再下田?”他笑着说:“没关系,社员在田里劳动都不怕热,我们光看不干,就占了大便宜啦,走吧!抓紧时间。”我陪部长从村东先看了大场边的两块地,又到村南看了三队的两块地。最后我们到了村西,我们边走边看,他看得很认真,很仔细,一个多小时时间,部长看了全村大部分农作物。在村西边告别,他再一次握手,表示感谢,说以后有机会再来。约6点钟,离开南韩继村回京。

后来,部长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,十分关心南韩继村的发展。“文革”后失掉了联系。每当回首当年向王首道部长汇报南韩继村的情况时,他那和蔼可亲,没有一点官腔、官架子,平易近人的情景,总是令我难以忘怀。

彭真视察南韩继

8月的一天下午,我和徐庆文在田里正在检查生产情况,老远见到村西路边停着几辆轿车,有一帮头戴草帽、身穿白色衬衫的人,在玉米地边,边走边指指划划地在说些什么。我俩急忙向他们走去,走近一看,走在最前面的是身材魁梧高大的北京市委书记、市长彭真,还有市府赵凡、范谨、常甫等领导。徐庆文与领导一一握手问好,彭真风趣地说:“今天又来打扰你啦,你不会嫌烦吧?”庆文激动地说:“我们盼着领导经常来检查指导我们的工作,说什么打搅、麻烦那,您这话有点不对呀!”然后,徐庆文转向我,向领导们介绍说:“这位是在我们村蹲点的公社干部肖文奎,我们配合的很不错。领导与我一一握手问好,我和徐庆文陪同市委领导到了大队部,因天热,搬了几个凳子,在院子两棵大白果树下,拿来几个半大碗,一壶白开水,边喝边聊了起来。彭真问我:“你叫什么名子?”我叫肖文奎。”在公社做什么工作?”组织工作,“蹲点有什么具体任务吗?”我说:“以‘小四清’为动力,以大寨为榜样,使这个村全面发展,为国家多生产粮食,力争比去年再增产增收,使南韩继这个先进典型再创佳绩。”彭真听后,说:“好哇!我等你们的好消息。”他又深情地说:“干部要坚持深入群众,多为群众办实事、办好事,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,我们党就靠这个‘法宝’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,不管到什么时候,这个传统都不能丢掉!”我向市领导保证说:“请市长放心,我要永远记住你今天的话。”市长高兴地说:“对!只要对群众有利的事,就坚决去做,对群众不利的事,要坚决不做,还要抵制。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。”接着转了话题,关切的问徐庆文:“有什么困难吗?,今年亩产能达到多少斤等等。”徐庆文都一一作了回答。他说:“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怀和公社领导的支持。目前没有困难。不过,亩产多少斤,一天不入库,我还不好说,还请领导原谅。”彭真笑着说:“你是怕大家说你吹牛吧!没关系,我们先订个君子协定,一不上报纸,二不上电台,三不在会上讲,怎么样?”转身问范

谨副市长：“这样行不？”范谨点头说：“行！”彭真对徐庆文说：“你们什么时候入库，核实了产量，我们再见报，但，必须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”。徐庆文征求我的意见后说：“如果不出意外，亩产 900 斤左右吧。”市长笑了，大家也都跟着笑了，笑声在大队办公室院内回荡着。此时，已近下午五点多钟了，我和庆文建议市领导吃晚饭再走，彭真笑着说：“不了，算你们欠我们一顿饭，这个账以后找时间要还的。”说的大家都笑了，在亲切的笑声中，我们送走了市领导。那笑声、那亲切的谈话声，那谆谆的教导声，虽已过去半个世纪，但，仍经常在我脑海中回荡，仿佛就在昨天，就在眼前。

彭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、市长期间，曾多次亲临南韩继村视察，与徐庆文等村干部和社员亲切交谈，并指示市有关部门搞好服务，大力宣传南韩继这个先进典型，他关心南韩继村的生产和建设，是南韩继村百姓十分崇敬和爱戴的老领导。南韩继村百姓永远不会忘记彭真的关怀和嘱托。